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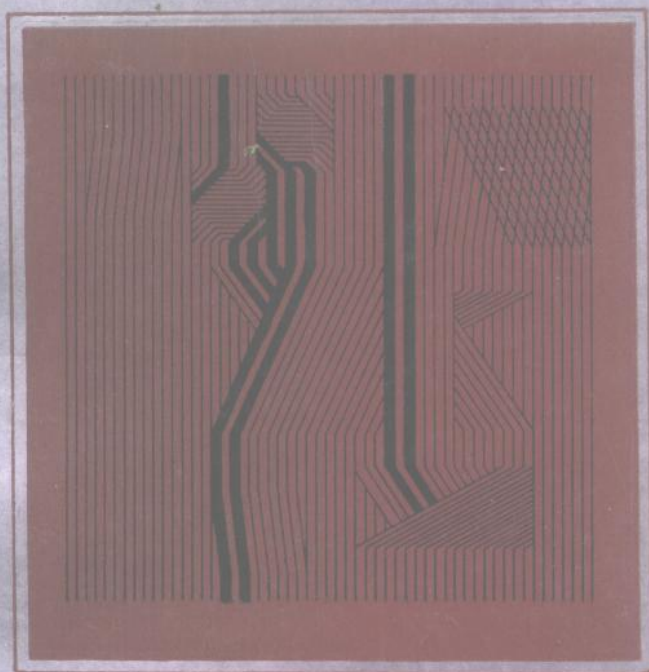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匈) 阿格妮丝·赫勒 著
衣俊卿 译

日常生活

YANJUECONGSHU



重庆出版社

2 016 8613 0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日常生活

YANDIUCONGSHU
YANDIUCONGSHU
YANDIUCONGSHU

Agnes Heller

EVERYDAY LIF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AND NEW YORK 1984

根据伦敦和纽约的罗特莱吉和凯根
保罗出版社 1984 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冯克焕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黎东

〔匈〕阿格妮丝·赫勒著 衣俊卿译

日 常 生 活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4 字数238千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
ISBN 7-5366-1377-6/D·50

（内部发行） 定价：4.55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

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者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从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

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英文 版 序 言

此书写于1967—1968年间，并于1970年第一次以匈牙利文发表。接着，依据匈牙利文版译出的意大利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相继问世。我很快发现原版中的某些累赘，这一现象部分地与过多的实例有关。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同意出一个德文缩略本，这一版本由苏尔坎姆普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1981年再版）。尽管我尊重编者的工作，但是关于恰当的缩略版，我与他有不同的设想。由此，当有人提出出版英文版的设想时，我决定亲自缩写匈牙利文原版。

搞一个差不多写于20年前的书的缩略本，几乎总是一桩令人不快的劳作，这里包含一些潜在的危险。首先，必须抵制重写某些部分的做法，不能为进行某些与作者目前见解和著述相吻合的分析所诱惑，屈从于这种诱惑无异于对此书的一贯性的破坏，这是无论如何都应避免的。因此，我没有改动任何观点或结论。甚至原版的范畴排列亦保持本来面目。我没有为本书增补此后就这一课题或类似课题所作的著述中的任何观点。英文版不但忠实于原作的要旨，而且的确是原作本身的缩略译本。

《日常生活》写于那个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口号的时代。此书的首要目的正如标题本身所示：勾划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然而，甚至还有更大的抱负。我决定一方面通过制定哲学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勾划新的哲学框架来开辟新的途径，而又保持对马克思精神的忠诚，同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主要传统决裂。正是在本书中我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框架，此后除了进一步精心制作和偶尔的改动外，我从未改变这一框架。

可以把此书的方法描述为现象学方法同一种分析步骤的结合。后者我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由于此前我曾写过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1958—1959)，所以我特别熟悉并赞同他的分析步骤。但是，我也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在规范与规则不再被视作理所当然，传统价值已被破除的现代，除非建立起“现象”本身，否则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无法得以贯彻。胡塞尔和经过批判修正的海德格尔可以提供借以解释现象本身的方法。

我们无法同样简洁地概括本书的哲学构架，因此我把这些前言评论局限于基本的东西。正是在本书中我形成了关于对象化范式的特殊见解：即“自在的”对象化领域的范式。由于这一对象化领域是一个可经验的普遍原则，因而所有社会范畴均可借助这一对象化得以理解，由此可以避免超验推论的方法。由于正是这一领域也大体上——即便不是完全地——规定着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这样，日常生活理论的中心地位就从理论上建立起来了。这样一种概念的反历史循环论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反历史循环论的”决不等于“反历史的”。相反，我一直寻求强调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异性，同时强调由“自在的”对象化领域所提供的规范和规则的内涵的历史变化性。不仅如此，那时我还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进化主义，赞同历史哲学，后来我放弃了这些特征。同样，我坚持认为，“自在的”对象化领域，以及日

常生活的模式包含有历史常量，必须联系历史变量来考虑这些历史常量。我认为，尽管有某些日常生活模式的不变因素，仍然可以改变日常生活，使之人道化和民主化。强调这种可变的可能性旨在对海德格尔的立场提出质疑。至于谈到这一理论的实践意图，反海德格尔的要旨是清楚无误的。

日常生活如何能在人道主义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得以改变是本书讨论的现实争端。该书提供的答案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改变的内在组成部分。我基于这样的理由来论证态度改变的可能性，即本质上倾向于优化变革的态度确实存在，只是需要加以推广。涉及到这一态度时，我创造了“个体的个性”(individual personality)这一术语(同“排他主义的个人”[particularistic person]相对)。忠实于现象学的方法，我从对这两种态度的区分开始自己的讨论。我从未设想过“完善性”；“个体的个性”决非完善，但它足以担当人道的日常生活的主体的(运用那时很时髦但相当含糊的术语，我称之为非异化的)。尽管抛弃了完善性，我还是提出了最古老的哲学反思问题，任何人均无法解答，但构想优化变革的哲学又不能不谈论的问题，这就是，“蒙受不公正要优于制造不公正吗？”如果说这是一个“道德化”的问题，那么就随它如此吧。

受教于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的英语读者或许会发现，本书的大陆式范畴体系是令人困惑的，有时甚至人为地过于复杂化。黑格尔对“自在”，“自为”，“自在与自为”和“为我”的区分分别被用于与之相适应的三个对象化领域。但是，假如在书中恰当地界定(或再限定)这些范畴，那么它们的运用不会给读者带来过分的困难。本书的另一核心范畴，“类本质”或“类本质性”是从马克思那里，尤其从《巴黎手稿》中借用的。所有对象化领域都被称作“类本质的”。它

们被区分为“自在的类本质”，“自为的类本质”，最后，“自在和自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自在的类本质”代表被“理所当然地”占用的人的可经验的普遍原则，而“自为的类本质”则代表着运用自由意志的对象化领域，对这一领域的反思体现了先前的意志行为和反思行为的具体化。通过引进这些范畴已足以把这些领域限定为“类本质的”。在所有使用这一术语之处均重复这一限定，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必要的和累赘的。然而我不想删掉它，因为“类本质”概念表明我主要受益于马克思的遗产，尤其受益于卢卡奇的遗产。正是卢卡奇在他的《美学》第一章（关于日常思维）中把类本质概念置于讨论的前沿，我常常参考此书。尽管如此，我在目前这本书中修改了卢卡奇对“类本质”的阐述，连续性同样应当被视为非连续性。

收到《日常生活》德译本初稿后，我把它分寄给国外的几位朋友，其中包括库·沃尔夫(Kurt Wolff)。沃尔夫教授在充满赞美话语的答覆中，指出我的观点同许茨(Schutz)观点的相似性。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著名作者的名字，这一点我不得不归咎于那一时期东欧文化生活的闭塞。在读了《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之后，我也为巧合的相似性而震惊，尽管细思之也并不特别令人吃惊。由于胡塞尔，以及在稍次一点的程度上还有韦伯对我的影响并不亚于他们对许茨的影响，相似性就很容易得以解释了。无论如何，特定的观念总是处于“流动中”，更确切地说，处于给定时代的历史意识之中，只要对同样的问题加以谈论，巧合就在所难免。尽管有一些相似性，但我的观点从总体上区别于许茨的观点。首先，在我的著作中，“日常生活”不等同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概念涉及行动和思维中的一种态度（自然态度），它同制度化（合理化）的行为和科学思想形成对照。日常生活则不是一种态度，它包含（或至少可以包含）各种态度，其中包括反思的一理论的态度。它是每一社会行动，制度和人的一般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虽然“自在的”

对象化领域、作为日常生活的支柱同所有“自为的”对象化(不仅仅同科学,而且同艺术、宗教、抽象道德规范和观点)形成对照,但是日常生活并不必然只在“自在的”对象化领域的引导下进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求助于更高的对象化,同时我们可以检验和怀疑“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规范和规则。因此,我这本关于日常生活的书的实际意图同许茨的解决方法相矛盾,后者以接近实用主义系统论而告终。尽管运用现象学方法,我的这一成果更接近所谓“批判理论”而不是许茨。同时,赞同对日常生活(以及由此对社会生活)加以改变的可能性的推动力无疑来自马克思和卢卡奇的遗产。

阿格妮丝·赫勒

中译者序言

(一)

日常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是每个人无时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活动；然而，它又是最少引起人们的反思，最少吸引理性探究目光的领域，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给定性的王国。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对日常生活哲学（即日常生活批判）的关注，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以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他们在二三十年代的理论探索和实践预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的可能的发展方向，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哲学转折”，即从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变革的优先性的关注，转向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的强调。通过对西方社会的统治结构和物化（异化）结构的分析，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不单单地表现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是以物化意

识、操纵意识和文化霸权为特征的总体性统治，因而，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是单纯的政治经济革命，而应是同时也包括文化、心理等所有方面在内的总体革命，其中意识革命、文化革命等不应是政治革命和经济变革的后果或伴随现象，而应当是首要的历史进程。

30年代初，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式发表，引起了西方一些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重视，由此他们发现了把马克思思想同当代历史进程相结合的契机。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兴趣有增无减，他们愈加把这一理论视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并且从不同方面拓宽异化范畴的内涵，以此为根据对现存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批判，意识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等等愈来愈引人注目，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卢卡奇在《美学》(1963)等著作中对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某些探索性批判；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1946)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68)等著作更是独树一帜，他由此成为日常生活批判领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们在这里献给读者的赫勒的《日常生活》一书，直接师承卢卡奇，并吸收了列菲伏尔等人的某些研究成果，是迄今所见有关日常生活的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专著。

(二)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匈牙利人，192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1955—1958年她作为卢卡奇的学生和助手，在卢卡奇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1958年，赫勒因为“错误和修正主义思

想”而被开除出布达佩斯大学并被清除出党。1958—1963年间她在布达佩斯的一所中学任教。1963年赫勒得到平反并恢复了名誉。1963—1973年间她在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1968年赫勒在南斯拉夫出席一年一度的科尔丘拉夏令学园，会议期间发生了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她同与会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份抗议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声明书上签了名，为此她回国后受到批评。1973年赫勒被批评犯有“左倾”和右倾思想错误。1977年赫勒同丈夫一起离开匈牙利去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市拉托堡大学讲授哲学和社会学。1985年赫勒又同丈夫移居美国，她应聘为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的哲学教授。

赫勒著述颇多。在匈牙利期间她已发表几部著作。移居国外后，她原已发表的著作和尚未发表的手稿分别被翻译成英、德、意大利、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发表，近年又推出许多专著。迄今赫勒已发表专著、论文集并主编著作20多部，其中最主要的有：《亚里士多德哲学》、《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引论》、《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日常生活》、《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卢卡奇再认识》、《历史理论》、《情感理论》、《激进哲学》、《论本能》、《羞愧的力量》、《对需要的专政》、《社会主义的人道化》、《在正义彼岸》，等等。

赫勒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直接受教于哲学大师卢卡奇，她是卢卡奇最得意的学生之一。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她同丈夫费·费赫尔(Ferenc Feher)、乔·马尔库什(Georg Marcus)、米·瓦伊达(Mihaly Vajda)等几名卢卡奇的学生以及一些卢卡奇的信奉者一道，围绕着卢卡奇形成一个学术圈子。卢卡奇在逝世前不久的一次谈话中，称这些人为“布达佩斯学派”。赫勒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布达佩斯学派”同“南斯拉夫实践派”等

等同属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它同西方一些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致力于人的存在和本质的探讨，致力于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和对人类存在困境的反抗；另一方面，它又特别关注现存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和人道化问题。

从上述所列书目已可以看出，赫勒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她曾把自己关于本能、情感、需要、道德、人格、历史等六个方面的研究统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相比之下，在她所涉猎的众多领域中，最能代表她的思想的是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人的本质(潜能)、基本需要和日常生活。

赫勒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和《论本能》等著作中阐述了自己对人的本质(本性)的基本观点。她明确指出，她的注意力中心既不是人类从自然中突现的进程(人的自然发生史)，也不是当代人的生物结构，而是人的潜能。赫勒不是把人的本能、情感等等视作预先存在的、先定的东西。她主张在人的内部建构，即人的“第二天性”(“心理—社会本性”)的变化中寻找人的潜能。

赫勒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和《对需要的专政》等著作中表述了关于基本需要的理论。她认为，按照青年马克思的构想，彻底的革命必须是基本需要的革命，在未来以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为基础的社会中，人类的需要结构将发生根本的变革，那些以自身为目的并成为第一需要的活动和人际关系将取代生产劳动和物质消费而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赫勒对现存社会进行了批判。在她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是受人控制和操纵的，实质上是“对需要的专政”。

与基本需要理论密切相关的是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在这里，她始终关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揭示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结构；二是探寻使现存日常生活人道化的可能性。

(三)

《日常生活》一书写于60年代末,1970年在匈牙利第一次发表,迄今已出版意大利文版、西班牙文版、德文版、塞尔维亚文版和英文版。卢卡奇曾亲自为《日常生活》的匈牙利文版作序。本书共分四编,结构严谨,逻辑思路清晰。遵循书中的逻辑演进,我们可以获得对日常生活领域较为完整的把握和理解。

第一编主要是对日常生活范畴的界定。赫勒运用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类”(类本质)和“对象化”两个基本范畴,从理论上建立起人的日常生活。她把日常生活界定为“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个体的再生产一方面不断再生产出个人自身,另一方面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即是说,个人以此为基础而“塑造他的世界(他的直接环境)”。赫勒从自然和社会两个视角对日常生活加以限定。就其同自然领域(“自在存在”)的自在性与给定性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把个体的再生产(日常生活)同政治、科学、艺术、哲学等社会活动及其对象化一道划归“自为存在”,它们都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然而,如果只在社会领域内部考察,那么可以断言,个体再生产(日常生活)只是“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因为日常生活主体尚未像从事科学、艺术、哲学等“自为的”类本质活动的个体那样,形成与类本质的自觉关系(即自由),而是同类本质处于自在的缄默的关系之中,整个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对每个人而言是自在给定的。

基于这样的立足点,赫勒在这一编中一方面通过划定“特性”与“个性”的区别,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个体再生产在其中得以展开的社会整体(阶级、团体、群体、共同体)而进一步建立起一般的日